明清以来大运河聊城段城镇发展与功能变迁研究

吴金甲[1]，乔　芙[2]

（1.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00；
2.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山东 聊城 252000）

摘　要：大运河作为闻名于世的水利工程设施和城镇人居环境的支撑系统，对沿运城镇的发展演化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确城镇历史发展脉络对沿运地区特色城镇建设具有重要历史借鉴。以明清以来大运河聊城段代表性城镇为研究对象，基于史志资料并利用 GIS 等工具进行分析与研究，探讨聊城段运河城镇聚落空间分布轨迹，并以商业发展为例探索城镇发展演化状况，在运河兴衰背景下分析城镇商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研究的开展可为当前建设特色城镇，实现沿线乡村振兴提供历史相似型。

关键词：大运河；聊城区域；城镇发展；城镇功能

中图分类号：G63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2-0039-09

收稿日期：2025-01-10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23CGLJ05）：整体性视角下山东省大运河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体系研究。

作者简介：1.吴金甲（1987-），男，山东嘉祥人，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讲师，理学博士。
2.乔　芙（1989-），女，山东泰安人，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教师。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2.012

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沿运城镇是大运河沿线的明珠，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如何挖掘大运河在新时代的功能和价值，利用好运河价值来带动沿岸城乡发展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①。聊城是重要的运河城市，在明清时期因漕运兴盛而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商业都会，聊城地区城镇的形成和发展也深受大运河的影响②。梳理聊城段城镇发展脉络，深入挖掘聊城段城镇运河文化文脉，有助于保护和利用运河文化，发展具有特色的运河文化产业，促进文化消费，带动运河沿岸城乡发展③。基于此，本文以明清至今的大运河聊城段城镇发展及功能变迁历程为基点，深入挖掘城镇空间分布演变过程和演变机制以及对聊城商业等方面的影响，探究大运河聊城段城镇功能变迁的范式，丰富城镇的运河历史文化底蕴，以期实现运河价值的重新利用，推动聊城段城镇实现特色化发展。

一、研究区域概况

本文所讨论聊城地区包括历史时期东昌府区及当前聊城地区所管辖范围，并有所扩展，不同时期有一定差异。明清时期，聊城称东昌府，会通河重新疏通，大运河山东段通航，聊城、临清等城镇成为会通河沿岸重要的城市，交通优势突出，成为全国闻名的商业都会④。聊城段城镇以运河为主要发展轴，以卫运河、马颊河等为重要发展轴，以运河闸坝、码头为重要增长点，在主要城镇临清等的辐射带动下逐渐发展起来，吸引了来自山陕等全国各地区的商人在此经商，棉纺织业、酿酒业、船舶维修、毛笔制作、刻版印书等手工业

①张廷皓：《新时代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新使命》，《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9 年第 3 期。
②陈永金、刘加珍、张重阳、彭博：《聊城市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经济研究导刊》2011 年第 31 期。
③赵艳、卞广萌：《文旅融合视域下大运河沿线乡村产业升级路径研究，《农业经济》2021 年第 9 期。
④郑民德：《明清山东运河城市历史变迁研究——以聊城为对象的考察》，《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5 期。

以及因漕运衍生的食宿等相关服务业逐渐兴盛，聊城段城镇因此获得繁荣发展[①②]。清末以后黄河改道、运河淤塞以及现代交通运输方式的发展，运河衰落，聊城段城镇交通优势以及商业势力随之消失，聊城段城镇逐渐衰败[③]。

二、大运河聊城段城镇空间变化

探究城镇的形成和分布状况是认识城镇发展的重要内容。城镇的形成和分布状况受到地形地貌、人口集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明清时期，大运河在聊城的贯通聊城段城镇形成和分布的重要影响因素，对明清时期至今大运河沿岸城镇空间分布状况进行分析，有助于明确在大运河的辐射带动作用下聊城段城镇的发展过程和发展机制。

（一）明朝时期沿运聚落空间分布

明代，东昌府下辖临清州[④]、高唐州、濮州3州，聊城县、堂邑县、茌平县、博平县、恩县、清平县、莘县、冠县、丘县、夏津县、武城县、范县、观城县、朝城县、馆陶县15个县[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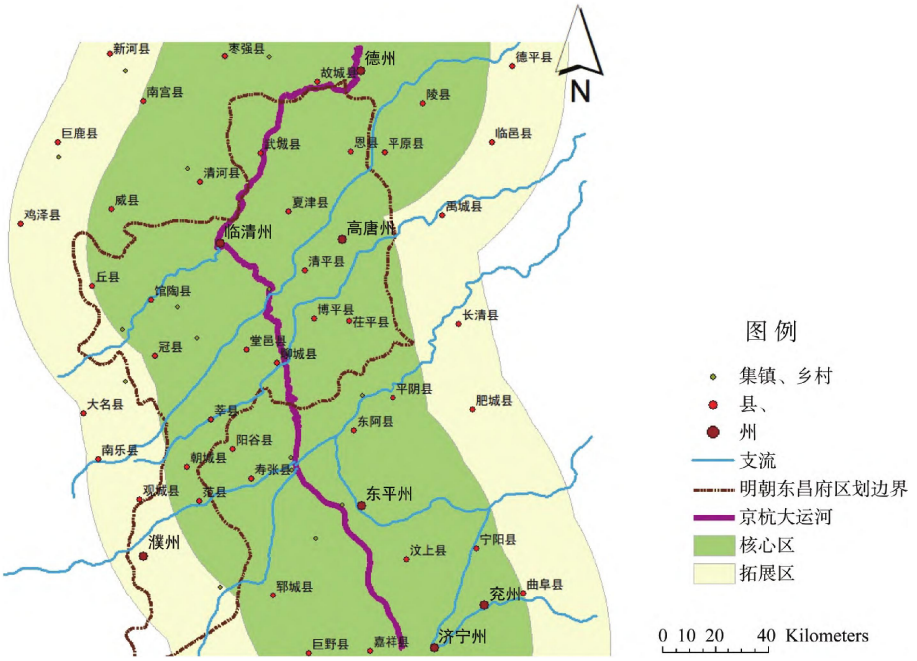


图1　明朝聊城段各类聚落空间分布

为便于纵向对比聊城段聚落集聚状况，将明代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大名府、广平府、顺德府、真定府、河间府和兖州府的距大运河80 km的范围，定量研究沿运聚落空间分布。为明确大运河周围80 km范围内聚落集聚程度的变化趋势，采用基于渐变尺度的空间计量方法（VCM），分别选取距大运河10 km、20 km、30 km、40 km、50 km、60 km、70 km、80 km分别作为缓冲区半径，将该时段研究对象分为州、县、集镇或乡村三种类型，通过梳理不同缓冲区半径下各聚落类型数量的变化，统计不同缓冲区半径下各类聚落的数量，分别计算各聚落类型的聚落聚集百分比，绘制出各类型聚落图，进而绘制以聚落聚集百分比（每个缓冲区

①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②杨轶男、张弘：《市民文化视阈中的清代山东运河城市民间坊刻——以聊城书庄为中心的考察》，《理论学刊》2012年第6期。

③刘永：《京杭大运河与聊城的兴衰》，《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④明弘治二年（1489），临清县升为临清州，领馆陶县、邱县，属东昌府。

⑤[明]万历《东昌府志》卷1，《图考》。

内聚落增加的数量占聚落总数的百分比）为纵轴、缓冲半径为横轴的 VCM 曲线图，来反映运河沿岸聚落分布的密集程度。根据运河沿岸聚落分布的密集程度，将距大运河 0－50 km 和 50－80 km 的区域分别划定为核心区和拓展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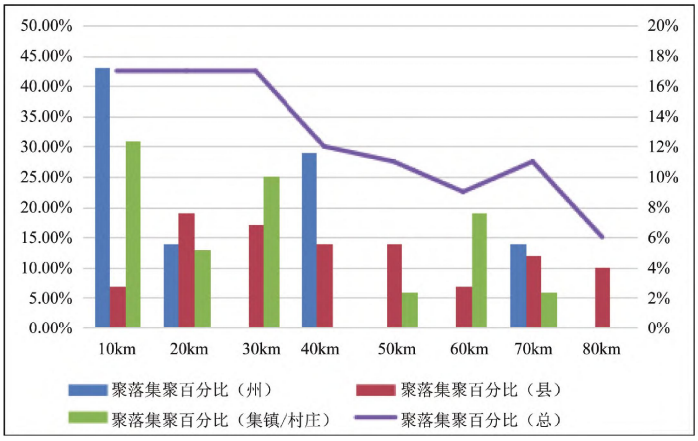


图 2　明朝聊城段聚落空间分布 VCM 曲线以及各类聚落集聚比例

从明朝大运河聊城段沿运聚落空间分布 VCM 曲线来看，聚落集聚程度总体上随着距运河的增加而呈下降趋势，聚落集聚在 0－50 km 以内，且在 0－30 km 缓冲区范围内，聚落集聚程度最高；当缓冲区半径达到 50 km 时，聚落累计增量达到 74%，表明明朝时聊城地区的聚落主要分布在大运河 50 km 以内。

从各类聚落集聚柱形图来看，州一级城镇在 0－40 km 内集聚程度最高，占 86%，为德州、临清州、高唐州、东平州、济宁州和兖州；县一级城镇 0－50 km 内增量最多，占 71%，其聚落集聚程度在 20 km 处达到峰值；集镇或乡村聚落集聚程度在 10 km 处达到峰值，缓冲区半径达到 30 km 时，集镇或乡村聚落累计增量达到 69%，之后集镇或乡村聚落集聚百分比大幅降低，说明集镇或乡村聚落主要集聚在距大运河 0－30 km 内。这表明聚落有一定的沿运分布趋向。聚落在 0－50 km 内集聚程度最高，且 0－30 km 内的城镇聚落如临清、德州、东昌府等作为区域政治、经济中心对县、集镇乡村等聚落分布和发展具有明显的辐射带动作用。

（二）清朝时期沿运聚落空间分布

清朝，东昌府辖临清州[①]、高唐州 2 州，聊城县、堂邑县、博平县、茌平县、清平县、莘县、冠县、邱县、馆陶县、恩县、夏津县、武城县 12 县[②]。与上述研究方法一致，结果如下图：

从清朝大运河聊城段聚落空间分布的 VCM 曲线来看，聚落集聚程度总体上随着距运河距离的增加而呈下降趋势，聚落在 0－40 km 缓冲区以内最为集中，且在 10 km 缓冲区范围内，聚落的集聚程度最高；当缓冲区半径达到 50 km 时，聚落累计增量达到 74%，说明清朝时聊城地区的聚落大部分分布在距大运河 50 km 以内。与明朝时期大运河聊城段聚落空间分布的 VCM 曲线对比，清朝时大运河聊城段聚落空间分布 VCM 曲线下降趋势更加明显，说明清朝时聚落在 0－40 km 缓冲区范围的集聚程度增强。

从各类聚落集聚柱形图来看，州一级城镇在 0－40 km 内最为集中，占 86%，分别为德州、临清州、高唐州、东平州、济宁州和兖州；县一级城镇 0－50 km 内增量最多，占 71%，其聚落集聚程度在 20 km 处达到峰值；集镇或乡村聚落集聚程度在 10 km 处达到峰值，缓冲区半径达到 30 km 时，集镇或乡村聚落累计增量达到 55%，说明集镇或乡村聚落在 0－30 km 内较为集中。

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清朝时聊城段州、县数量及分布变化较小，在中心城镇和小城镇的带动作用下，集

①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临清州升为直隶州，辖邱县、夏津、武城 3 县，不属于东昌府管辖，本文图 3 中清朝东昌府区划边界包括临清州的管辖范围。

②[清]嘉庆《东昌府志》卷 1，《舆地》。

镇乡村等聚落数量激增，河流两岸 10 km 范围内集镇乡村等聚落数量最多，且其他区域集镇乡村数量增量也很大，聚落分布表现出向运河沿岸集中的趋势。此外，也表现出向卫运河以及马颊河、徒骇河、赵牛河、魏河等向运河连通的河道周边密集分布的趋势。运河与周围自然水源为城镇发展提供水源，构成的水路网沟通地区间的交流，运河交通运输和经济贸易功能辐射范围扩展到周围地区，运河作为发展轴线带动周围城镇的发展。而运河的闸坝、码头等重要的交通枢纽则促进了集镇、乡村等小城镇的发展，大运河沿岸城镇的发展吸引了商人、手工业者集聚，承担着经济贸易功能，随着经济发展，辐射范围不断扩大。这表明明清朝时运河周围城镇网络发展已趋于完善，辐射带动作用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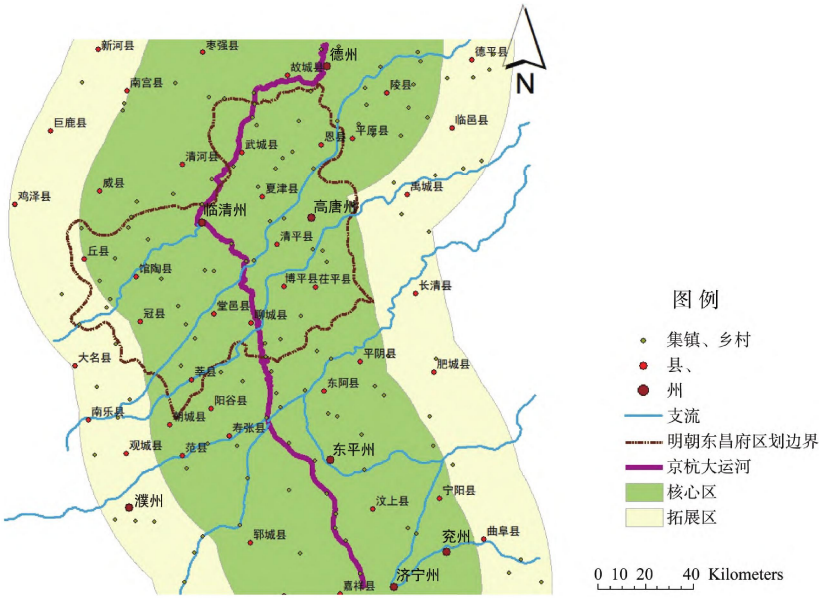


图 3　清朝聊城段各类聚落空间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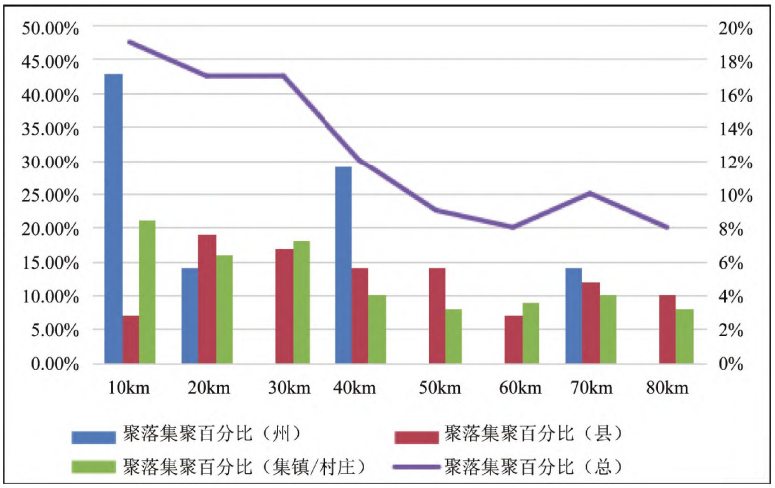


图 4　清朝聊城段聚落空间分布 VCM 曲线以及各类聚落集聚比例

（三）现代沿运聚落空间分布

现代聊城市辖 2 个市辖区、1 个县级市、5 个县，分别为临清市、东昌府区、高唐县、茌平区、东阿县、冠县、莘县、阳谷县。



图 5　现代聊城段各类聚落空间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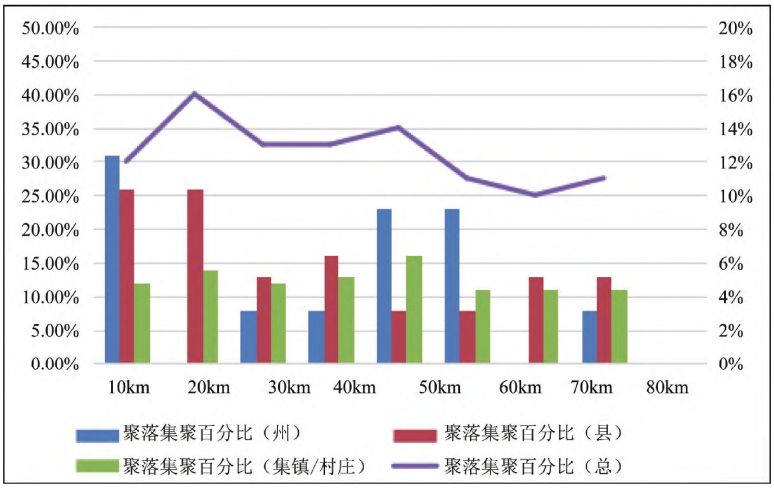


图 6　现代聊城段聚落空间分布 VCM 曲线以及各类聚落集聚比例

从各类聚落集聚柱形图来看，市或区一级城镇聚落主要集聚在大运河沿岸 10 km 内，占 31%；县一级的城镇聚落集聚在 10 km 和 20 km 处分别达到峰值；集镇或乡村聚落集聚程度区别较小，说明集镇或乡村分布较为均匀。

相比明清时期，现代城镇聚落空间分布较少受大运河的影响。清末和民国时期运河淤塞、现代交通运输方式的出现再加上连年战乱，大运河的交通运输和贸易交流功能逐渐丧失，依靠大运河运输的商业、手工业衰落，大运河的辐射带动作用逐渐衰弱，运河区域聚落网络体系也趋于分散化。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对大运河进行疏浚和修建，但大运河聊城段并未通航，再加上现代交通运输方式铁路、公路、航空、海运等的发展，大运河的交通功能和作用湮灭，运河沿岸城镇地位大不如前。聚落的空间分布更多地受到高速公路、铁路网的影响。由于聊城地形平坦，现代交通网络分布均匀，聚落分布也较为均匀。

三、大运河聊城段城镇商业发展研究

前文探究了大运河聊城段城镇聚落空间分布状况，梳理了城镇发展过程和发展机制。城镇发展表现在城镇规模、人口、经济、交通、文化等诸方面，大运河贯通对聊城段城镇经济发展影响较为深刻，而城镇发展中经济发展最具代表性。以经济发展中的商业发展为例介绍大运河聊城段自明清以来的商业发展轨迹和对该地区运河文化风尚遗存的影响，并分析商业发展的影响因素，通过商业发展变化反映聊城段城镇发展状况，以进一步研究城镇功能变迁。

（一）聊城城市商业发展轨迹

大运河贯通以前，聊城段交通闭塞，商业发展落后，直至明清时期大运河贯通，改变了聊城的区位条件，商业才逐渐发展起来，并成为山东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清朝后期运河漕运衰败，聊城地区商业发展停滞。新中国成立至今，政府对古运河开展修复，并大力执行运河保护和利用的相关政策，大运河及其沿岸城镇迎来新机遇。其间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变化是发展轨迹出现波动的主要原因，大体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初步发展阶段

明朝初期是聊城经济从衰败到复苏的阶段。唐代以后，由于战乱、旱涝灾害、瘟疫流行等原因，聊城地区的政治经济残破，耕作不兴，人口凋敝，城镇衰落，属全国经济边缘区[①]。明初，虽有向聊城地区移民垦荒的政策，但随后四年的“靖难之役”又导致聊城地区陷入经济凋零的战乱中。明永乐九年（1411 年）至永乐十四年（1416 年）重新疏浚会通河，大运河聊城段贯通改变了聊城的区位条件，聊城地区成为南北漕运要冲，逐渐发展起来。

2.全面繁荣阶段

明朝中后期到清朝中期是聊城地区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位于南北交通大动脉区位优势给聊城商业发展带来巨大的红利，从根本上改变了聊城地区交通闭塞的局面，再加上这一时期良好的政策优势，促进聊城段经济进入全面繁荣阶段。

京杭大运河的贯通还推动了聊城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以棉花及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状况为例。聊城地区地势平坦，水源充足，土质砂壤，适宜各种经济作物如棉花、果品等种植。聊城地区产棉全国闻名，其生产的棉花量高质优，可供向全国市场销售，又因大运河南北通达，为棉花转售提供优良的交通条件，聊城地区因此参与到全国性商品流通格局中，经济实力大幅增长。此外，棉花的大面积种植使得聊城手工业得到初步发展，纺织成为最为广泛的手工业，推动了聊城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变，棉纺技术迅速提升，其棉纺织品在我国北方地区大量销售，成为北方地区出售棉布商品的产地。总之，明朝后期到清朝中期聊城地区的商品经济的繁荣到达顶峰，南北贸易往来频繁，客商集聚、物资集散、移民入迁十分活跃，带动了聊城商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也使得聊城人改变了重儒轻商的观念，涌现出大批参与贸易往来的商人。

3.衰落阶段

清朝中叶以后聊城段商业日渐衰落。由于运河淤塞，吏治腐败，大运河得不到有效治理，开始丧失运输能力。道光四年（1824 年），黄河冲毁运道，运河淤塞更甚，清朝后期，清政府自身腐败，管理漕运的官员贪腐，运河淤塞迟迟得不到有效疏浚且贪漕运之利，运输成本提高，漕运难以维持。再加上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一方面造成战乱和政权动乱，失去稳定和平的环境来支持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冲击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海运以及各种现代交通运输方式代替了漕运，聊城地区的交通优势不复存在。且聊城地区商业主要依靠手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可以依靠的工业和经济支柱，很大一部分商人来自山陕地区，在聊城商业发展处于劣势，政治经济功能大不如前的情况下，商人和手工业者逐渐离散，商业发展遭受了重创，逐渐衰败。由于临清等地受到战乱破坏更为严重，周围地区的商人及资本向东昌府区转移集聚，衰

---

①史晓玲：《明清时期聊城商业发展与城市变化》，聊城大学硕士学位，2014 年。

落速度相对缓慢，商品交流依然相对繁荣，但随着航路长期停滞，山东北段运河淤塞难清，难以实现通航运输，东昌府区的商人也陆续撤离，商业萧条，经济衰落。

4.复兴阶段

大运河申遗成功和进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战略实施后，国家、省、市各层级政府对运河保护和规划的力度增强，把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运河航运转型提升统一起来，为运河沿岸协同发展带来机遇。大运河聊城段流经区域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需要发展有潜力的产业带动区域经济，张秋、七级等运河古镇拥有独特的文化历史，在运用运河文化遗产实现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阳谷县等运河沿岸城镇目前正在保护与修复运河文化遗产，开发大运河文化旅游产品，带动聊城地区运河沿岸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为聊城段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①。

（二）商业发展背景下聊城地区社会生活

明清时期是大运河聊城段商业繁荣发展主要阶段，大约有持续400年的繁荣期，对聊城地区的社会生活有深远的影响，下面从对人口总数和生活方式两方面的影响进行阐述。

1.商业发展背景下聊城地区的人口变化

首先，商业发展背景下聊城段人口总数总体上呈上升趋势。明初，朱元璋采取了鼓励向鲁西地区移民等措施，东昌府出现大规模移民潮，后来随着大运河的发展，聊城地区吸引了大量人口聚集在此。人口总数一直呈上升趋势；明朝中后期，聊城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人口稠密；清代，嘉庆时期，商业繁荣，人口数量增多；而到了清末，商业萧条，大量商人撤离聊城地区，但总体上，从明朝到清朝人口总数呈上升趋势②。

其次，商业发展背景下聊城段人口的组成发生变化。聊城地区增加的人口除自然增长外还有官方移民、客籍商人和客籍官员。明洪武年间，政府组织大量山西移民迁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山陕商人优先选择聊城地区进行商品交易奠定了基础，明朝大运河通航后，聊城地区商业获得快速发展，大量客籍商人涌入聊城地区，在此安家落户，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吸引了许多客籍官员在此定居③。

2.商业发展背景下聊城地区的生活方式变化

首先，从事手工业的人口数量增加。聊城段棉花、果品等的种植促进了其经济发展，反过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棉纺织业、棉布加工业、服装剪裁、食品加工等的繁荣，除此之外的手工业门类还有船舶维修、毛笔制作等④。就船舶维修业而言，大运河的通航使得大量货物运输的船只经聊城地区南北往来，因此对船舶维修工人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商业的发展为大量人口提供了工作岗位，调整了聊城地区的产业结构。

其次，弃官从商兴起。明清时期，受到商业繁荣的影响，聊城本地名门望族开始经商，这对聊城本地弃官从商影响深远。任、邓、朱、傅、耿聊城五大家中有四大家经营当铺以及小手工业作坊、酱菜、酿酒、运输等产业，名门望族经商进一步刺激本地人进行经商，改变了轻商的观念。

其三，民俗信仰的多元化。聊城本在孔孟之乡，尊孔重儒，商业发展以后，聊城地区在其影响下更加尊崇神灵，修建了诸多庙宇，以求商业兴隆、水运昌盛，但尊孔之道并未衰落，且随着商业发展将儒家所遵循的诚、义、信、忠、仁运用到商业理念中，坚持诚信经营，因此商业风气清明，文运昌盛⑤。

其四，嗜酒尚武。聊城产业中，酿酒业有着重要的地位，山陕商人开设的酿酒作坊的兴盛使聊城饮酒风俗风行，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日常生活，聊城人的饮酒之风长盛不衰⑥。聊城人尚武与其豪饮之风有密

---

①张思坚：《山东运河文化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②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7页。

③吴欣：《明清京杭运河区域仕宦宗族的社会变迁——以聊城“阁老傅、御史傅”为中心》，《东岳论丛》2009年第5期。

④胡梦飞、王伟：《东昌运河毛笔制作技艺传承与发展研究》，《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⑤胡梦飞：《明清时期聊城地区水神信仰述略》，《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⑥王云：《明清以来山东运河区域的嗜酒与尚武之风》，《东岳论丛》2009年第3期。

切的关系，自明清时期，聊城好汉辈出，不拘小节，涌现出诸多侠义的武林高手。

清朝后期至民国期间，社会结构在这一时期剧烈变动，运河漕运因各种原因走向衰败，对聊城社会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冲击。建国后至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运河文化熏陶下的风土人情仍影响深远，主要体现在该地区的艺术形式和生活方式两方面。一方面，由于聊城手工业在明清时期发展繁荣，聊城木板年画、雕刻葫芦等工艺精湛并保存至今，成为聊城地区具有鲜明运河文化特色的文化遗产。该地区木板年画构图丰满，颜色鲜艳，人物形象突出，将武将门神、民间传说、自然景色绘于木板上，至今仍受欢迎；聊城雕刻葫芦入选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统镂雕技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审美效果上的创新和精进，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并且通过举办葫芦文化艺术节等方式不断扩大葫芦雕刻的影响范围。另一方面，聊城在商业影响下的一些社会生活习俗延续至今，成为该地区独有的艺术形式，如查拳、临清潭腿等体现了聊城地区尚武的习俗。聊城的武术查拳始于清朝，形式复杂多样，包括“四击”“八法”“十二形”等，目前也是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练习查拳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提高审美情趣，经过长期发展，也受到广泛欢迎，形成了“查拳文化”；东昌府运河秧歌不仅体现了民间舞蹈艺术，还体现了传统武术，是力量与美学的结合。总之，聊城在运河的影响下形成具有运河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和生活方式，体现了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表明明清时期在运河的推动作用下聊城地区商业发展的影响之深远，留下了丰富的运河文化遗产。

四、大运河聊城段城镇职能演变分析

（一）政治军事功能

聊城自春秋时期就“石筑城屯兵马”，战略位置较为重要。明初，聊城段运河并未疏通且战乱灾荒频发，聊城段城镇军事功能突出，但经济无从发展。会通河疏浚后，聊城位于“漕运咽喉，交通要道”，交通优势显著，对商业交流、漕粮运输起着重要作用，但运河聊城段受黄河影响经常决口，影响漕粮运输和经济往来，故中央不仅在此修建闸坝等水利工程，还设置衙署夫役管理运河交通，河政地位异常显著，聊城境内如周家店、李海务等许多城镇都设置了重要的闸坝以及管理闸坝的官员，因此聊城地区城镇政治地位不断提高，成为山东甚至华北地区区域性政治中心。

（二）经济功能

明朝中后期到清朝中期，交通优势给聊城商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机遇，运河聊城段城镇的政治军事功能逐渐向经济贸易功能转变。漕运使得聊城运河沿线各地物资交流十分方便，聊城的棉花、枣、梨等地方特产得以转运到各地获得盈利，在漕运过程中，聊城地区的景象由荒凉凋敝转变为繁荣发展。运丁水手们成为运河聊城段重要的商业群体，在此地进行频繁的食宿和贸易活动，运河沿线码头成为商品贸易繁荣的地区，促进了食宿、手工业等的发展。聊城与周围临清、济宁等大都市对商业发展形成辐射带动作用，成为重要的商贸基地，吸引了大量外来商人在聊城地区开设商铺，运河的经济效益增大，促进了聊城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城镇繁荣，称“江北一都会”，经济进入飞速发展时期①。

（三）文化遗产功能

随着清朝末期战乱、灾荒、运河淤塞等的影响，运河逐渐走向衰落，国家对运河的治理与重视、外来商人势力等促进聊城段城镇发展的主要力量随之消失，聊城段城镇的经济功能趋向衰落②。但在城镇繁荣发展时期，聊城文化兴盛，留下了大量运河文化遗产，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运河古镇的保护与开发工作，聊城地区积极开展运河古镇的保护工作和对环境整治与美化工作，发挥运河古镇的文化遗产功能，带动聊城地区旅游业等文化产业的发展，实现文旅融合③。如张秋、七级等运河古镇在建设运河文化带的战略背景

①崔建利：《运河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新探索——读〈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②吴欣：《〈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评介》，《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11期。

③连维明：《聊城：运河文化的传承》，《中国名城》2008年第S1期。

下，成为运河文化的载体，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运河沿岸城镇的功能在新时代向生态、旅游等综合功能转变。

结语

本文梳理了大运河聊城段城镇的发展过程和可能的影响因素，以及大运河聊城段城镇的发展脉络，丰富聊城段城镇的运河文化底蕴。明清时期运河的贯通在一定程度上对聊城段城镇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并通过外力作用提高了聊城的商业地位，是聊城地区城镇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但由于战乱、运河淤塞、现代交通工具的推广，国家对运河的治理与重视、外来商业势力的汇聚、较为有利的交通区位优势、漕运的繁荣等外力作用消失，运河也随之衰落。而由于聊城的发展过于依赖运河贯通所带来的优势，其自身的实力与根基并不稳固，所以运河衰落对聊城地区的打击是巨大的。直到建国后，国家对运河进行疏浚与修复，运河才得以重新发展，并且为聊城段城镇发展带来新机遇。整个过程中，聊城段城镇的功能发生了由政治军事功能转为经济贸易功能，最后向文化遗产功能的转变。

本文研究了大运河聊城段城镇空间分布的发展轨迹与聊城段商业影响因素，进而总结聊城的城镇发展和功能变迁过程，但仅论述运河对城镇商业和聚落分布的影响较为片面，且在历史性研究方面存在历史资料的考证不够全面的问题，应当在今后的研究中给予补充。

Study on Towns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al Change of the Grand Canal in Liaocheng

WU jin-jia[1], QIAO Fu[2]

(1.The Grand Canal Research Institut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2. Liaocheng Senior Vocational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 Lliaocheng 2520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search the cultural heritage function and develop characteristic towns in Liaocheng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vein of towns to enrich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In this paper,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up to now the grand canal of Liaocheng town as research object, consult and combing the annals data by using GIS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data analysis tools such as, explore Liaocheng section of the trajectory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settlements, and in business development, for example introduces urban development condition, the cana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ise and fall analysis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By exploring, we can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al change in Liaocheng from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 the present,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canal towns,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and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Grand Canal; Liaocheng; urban development; urban function

[责任编辑　山阳]